



北魏平城研究文集

□ 主编·董瑞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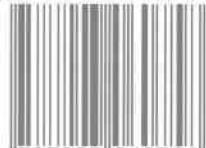
▼ 大同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 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卫东
责任编辑：赵虹霞

六同孝三普文化
研究会

ISBN 978-7-203-06075-8



9 787203 060758 >

定价：46.00元

北魏平城研究文集

□ 主编 .. 董瑞山

▼ 大同历史文化研究丛书之一
▼ 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魏平城研究文集/董瑞山主编.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4

(大同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1)

ISBN 978-7-203-06075-8

I. 北… II. 董… III. 文化遗址—大同市—北魏(439~534)—文集 IV. K878.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5444 号

北魏平城研究文集

主 编: 董瑞山
责任编辑: 赵虹霞
装帧设计: 卫 东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35 (综合办)
E-mail: fxzx@sxsccb.com
web@sxsccb.com
Renmshb@sxsccb.com
网 址: www.sxsc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省史志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张: 21.25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6075-8
定 价: 46.00 元



前 言

董瑞山

公元 398 年拓跋珪自盛乐迁都平城，改元天兴，“营官室，建宗庙，立社稷”，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首都建设。正封畿，制郊甸，建立官城、京城、郭城。平城成为当时我国北方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历经六帝七世，长达 97 年，成为大同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如今，平城遗址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魏都平城的研究和保护已迫在眉睫。为此，2005 年 11 月由大同市人民政府出面，市文物局和规划局经办，在北京新大都饭店会议中心，召开了平城遗址北京座谈会，有宿白、黄景略、徐苹芳、张忠培等 10 多位国家著名专家教授与山西省、市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我会顾问殷宪，副会长张畅耕、赵一德、力高才、姚斌，理事刘俊喜均出席了会议。会后，平城遗址的保护，被列入国务院批准的《大同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 年—2020 年）》，并被正在编制的《大同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所采纳。

近年来，我市史学界、考古界等许多专家学者，扬故土之美，倾乡梓之情，对魏都平城的研究逐步深入，写出多部著作，发表了许多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鉴于此，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于 2007 年 8 月 20 日在大同宾馆召开了“魏





都平城专题研讨会”。来自大同市文化、文物考古、地方史志、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与三晋文化研究会的领导以及友邻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学者代表共 40 余人，出席此次学术研讨会，有 26 位专家学者宣讲了论文，提交学术论文 30 余篇。

大家欢聚一堂，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其乐融融。论文围绕平城遗址、平城建设、云冈学研究、平城考古四个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分别阐明了各自的论点、论据。范围广博，内容丰富，有理有据，以理服人，展示了我市对魏都平城的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为我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开了一个好头，铺了路，奠了基，将研究会的中心工作真正转向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来。现选论文 26 篇，编为《北魏平城研究文集》，以窥斑见豹，从中了解对魏都平城研究的情况，推进这一历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大同是省内外著名的文物大市，大同有平城遗址、云冈石窟、北魏明堂遗址、方山永固陵等北魏遗存，又有辽、金西京时的文物古迹，明、清大同镇城，内外长城等大批历史文物。这是古城大同悠久历史的象征，是北方民族交融、文化源远流长的标志，是 5000 年中国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更是这座城市留给子孙后代和全世界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抓好这些遗存的研究和保护，既是传承华夏文明和发展先进文化的需要，也是实现大同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资源强市转变的必然选择。

魏都平城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物证，是平城展

目 录

- 北魏平城宗庙考 / 力高才 <1>
- 北魏平城宫城市建设浅探 / 高 平 <25>
- 如浑西水辨 / 妥子谨 <36>
- 北魏平城考略之二 / 曹臣明 <51>
- 从历史文献看北魏太武帝时期平城“西宫”和东宫” / 卢继文 <66>
- 北魏平城双阙考 / 张志忠 <80>
- 北魏明堂与平城考古 / 张海啸 <88>
- 魏都平城的生态环境 / 姚 斌 <94>
- 北魏金陵初探 / 古鸿飞 <105>
- 北魏京畿地区的城市建设 / 高 海 <118>
- 北魏曹天度石塔考 / 葛世民、葛钢 <122>
- 平城文化考略 / 赵忠格、高海阔 <134>
- 北魏平城的手工业 / 马志强 <170>
- 魏都时代与煤都时代的文化性格比较 / 冯 楨 <181>
- 试论冯太后的改革和历史功绩 / 曹 杰 <188>
- 孝文帝的汉化措施与先驱者的贡献 / 郭生彩 <202>
- 试论北魏王朝由京师平城向全国各地推广的
 养老保障制度 / 李大钧、李大宏 <211>
- 鲜卑民族与中华文明 / 管芙蓉 <223>





六镇与平城浅议 / 赵心瑞	<239>
云冈石窟壁面浮雕塔研究 / 王 恒	<245>
云冈山顶佛塔基址发现及其相关问题 / 刘建军	<269>
云冈第 16-1 窟的营造时代及其功德主 / 赵昆雨	<278>
云冈石窟屋形龕刍议 / 张 华	<288>
大同北魏墓葬出土俑群的时代特征 / 王雁卿	<298>
北魏平城墓葬绘画简述 / 高 峰	<313>
大同北魏墓出土的瓷器 / 李树云	<328>



北魏平城宗庙考

力高才

中国古代的制度文明，以礼制为渊海，集前古之大成，开后来之政教。而在礼制中，宗庙之制又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宗庙之制源于祖先崇拜，产生于发展程度较高的氏族社会阶段，在周代进入宗法社会后，有了重大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这套制度在中国数千年的宗法专制社会中，虽有小的损益，但基本原则一直传承着，直到清朝的结束。这些原则是：

一、前庙后寝制。每一皇朝的宗庙，都造在都邑即京城中，如同宫殿的前有“朝”、后有“寝”一样，前部是庙，后部是寝。东汉著名学者蔡邕说：“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列昭穆；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总谓之宫。”^①蔡邕的说法为应劭、范曄等人所赞同^②。这里的“宫”当然是指宗庙，是用围墙包起来的，用作祭祀祖先之用。宗庙的宗字，从“宀”从示，会意，本义即为宗庙，“宀”就是宫室的形象，示为其中所安神主象征。《说文》云：“宗，尊，宗庙也。”古人认为庙是祖先居住的宫室，所以把庙也称为宫，《左传》记载鲁国有“桓宫”、“炀宫”之说，其实就是桓公庙、炀公庙。庙也称为室，鲁国伯禽的庙就被称为太室或世室，见于《公羊传》和《谷梁传》。因为宗庙中有寝，有时庙也称为寝，《周礼·夏





官》中就谈到五寝、大寝、小寝等。又因为庙和寝都是宗庙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两者互相连接,如高诱所说:“前曰庙,后曰寝,《诗》云‘寝庙奕奕’,言相连也。”^③所以人们又经常以“寝庙”连用,《周礼·月令》仲春之月有“寝庙必备”的话。当然,正如古人所说,庙是接神之处,其处尊,故在前;寝是衣冠所藏之处,对庙而卑,故在后。庙都是南向的,因此所谓前庙后寝,也就是庙南寝北。庙和寝在建筑上的不同处是,庙有东西廊和序墙,而寝则只有室而已。这固然也体现着庙尊而寝卑,但更应当注意的是,它们的不同体现出其来源与作用的差异。虽然《尔雅·释宫》说“室有东西廊曰庙,无东西廊有室曰寝”,似乎区别不大,但事实上庙来源于朝,是按照朝的式样建造的,朝在室的两侧有东西廊,是让臣下在那里等候处理政务或准备朝见的,《仪礼·公食大夫》郑玄注:“箱,俟事之处”。《仪礼·覲礼》郑玄注也说:“东箱……相翔待事之处。”至于寝,它来源于君主及其家属饮食起居的处所,因而就没有设东西厢的必要。古代讲究“事死如事生,礼也”^④,庙中安放祖先神主,要及时祭祀;寝中陈列祖先的衣冠和生活用品,要同活着的时候一样侍奉,随时供奉新鲜食品,这是庙和寝的最主要不同处。君主宗庙又称太庙,据考证,西周初设五庙,即考(父)庙、王考(祖父)庙、皇考(曾祖)庙、显考(高祖)庙和太祖(始祖)庙,太祖庙又简称为太庙,因为太祖庙地位最高,所以太庙又成为君主宗庙的代称。西周中期,为了保持对周文王、周武王这两位功业显赫帝王的永久祭祀,将五庙扩大为七庙,即所谓“天子



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礼记·王制》）。后历代皇朝中，还有实行九庙制和十一庙制的，恕不述。但无论实行多少庙制，总是一庙一寝相对应。宗庙中祭祀的祖先，高（祖）、曾（祖）、祖（父）、父是必祭的，称为四亲庙；太祖庙则因有的皇朝对太祖和始祖的概念，或混淆不清，或硬性分割，导致称呼分歧。其实太祖就应当是皇朝始祖，太祖之外不应再定始祖。太祖的祖先当然还可以追溯出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但原则上一个皇朝的开国之君才应当称太祖即始祖。在格局上，东汉明帝改革太庙之前，太祖之庙在正北，寝即设于太祖庙之后。太祖庙前，祖孙同列，父子异列，按昭穆分左右，中间为祭庭。太祖庙永远不迁，叫做百世不祧之祖，其余远祖，就要根据他们与在位天子血统的远近而依次迁去神主，藏于祧庙，从而始终保持“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的格局（诸侯以下仿此，依次递减，即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汉明帝举行上陵礼，即在陵上祭祖，临终又下遗诏，声称为节俭不起寝庙，把神主藏到光武庙中光烈皇后（明帝之母）的更衣室中。其后汉章帝也这样办。后世遂不敢加，结果取消了宗庙中为每个祖先建立一庙的办法，破坏了长期以来天子宗庙实行的“天子七庙”的制度，实行“同堂异室”的办法，即如明朝北京太庙，前为正殿，两侧有庑，后有寝殿，正殿和寝都是九间开阔，每间一室，共分九室。正殿九室分储诸帝后衣冠，祭则陈设出来，相当于东汉以前的寝；后殿九间分列





诸帝后神主,相当于东汉以前的庙。无论正殿、后殿,皆为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一字形排列。宗庙中都安置着代表祖先的木主,又叫神主,“方尺二寸,穿中央,达四方。天子主长尺二寸,诸侯主长一尺。虞主用桑,练主用栗。卫宏《旧汉仪》曰:已葬,收主,为木函,藏庙太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则立主于坎下”。^⑤虞即虞祭,葬日还殡宫安神的祭名;练即练祭,小祥之祭。二祭不同所用木主材质也不同。木主平时用木函或石函盛之,藏于壁上之坎中。先秦时多用石函,称为“柩”,藏北壁;两汉则盛以木函,藏西壁,总的意图是防火。

二、左祖右社制。《周礼·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小宗伯》也说:“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这说的是周代的情形,但其原则精神为后世历代皇朝所继承。左祖右社,说的是国都之中,宗庙和社稷的相对位置关系。社即后土,即土地之神,稷为五谷之神,土地生长草木五谷,养育人类,被认为是具有无穷生命力的神灵。土地五谷是衣食之源,立国之本,“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⑥《墨子·明鬼下》说:“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家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故圣王其赏也必于祖,其戮也必于社。”《夏书·甘誓》也说:“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这说明在建设国都时,必须先立祖立社,祖和社功用不同。周是封建宗法大一统的王朝,规定只有天子有权祭天地,诸侯只能祭社稷,所以社稷之



祭在诸侯各国特别盛行。但社稷之祭在天子之都依然存在,因为天子祭天祀地在南郊圜丘和北郊方泽(也有改作方坛的),时间一般在每年冬至,要动员宗室和臣下,礼仪隆重;而祭祀社稷主要是春祈(仲春之月的吉日,又称社日)和秋报(孟冬之月的吉日),最直接的目的是祈求丰收。虽也有皇帝亲自主祭,然其礼仪究不及在郊外祭祀天地隆重。《史记·封禅书》说:“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以来尚(远)矣。”认为社稷的祭祀起于夏禹。《礼记·祭义》说:“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这就是说,社稷坛建在王宫前的右侧,而宗庙建在王宫前的左侧。宗庙是一个建筑群,而社稷坛则相对简单得多。从道理上说,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是两个概念,所以我国古代有的朝代是分建社坛和稷坛,相隔数丈而已。但大多数朝代合社坛和稷坛为一,坛上依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铺设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泥土,坛上并没有建筑物,这是为了使社稷台直接接受风霜雨露,上通于天。自古相传,一个国家灭亡了,其社稷就要废除拆毁,或者在其上盖屋,使之与天地隔绝,叫做“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⑦

三、左昭右穆制。前面已经涉及宗庙中的昭穆关系问题,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宗庙的排列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的,太祖居中,称祖考庙,第一代居右称昭,第二代居右称穆,以后三、五、七等奇数后代为昭,四、六、八等偶数后代为穆。昭穆相次,百代不乱。但不管设五庙、七庙、还是九庙,随着世(代)的递增,总是不





够,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设定祧庙,周以文武二庙为二祧,文武以前已迁之神皆藏太庙,文武以后当迁之神主皆藏祧庙。即除始祖不动外,各庙中的神主要依次迁入祧庙中,平时不再祭祀,直到每三年一次的“禘祭”时,一起总祭。祭祀的时间,周代每年四次,春夏秋冬各一次,分别叫做祠、禴、尝、烝。三年之丧期满,先祖的神主必须依次迁出一辈,这时需要总祭一次,即禘祭,第二年举行禘祭。以后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禘合称殷祭,殷是大的意思,表明礼仪盛大。祭品也有规定,周制天子用三太牢(牛羊猪各一为太牢),诸侯一太牢,卿用特牛(一头牛),大夫用少牢(羊猪各一只),士用猪,庶人用鱼。以后各朝代对此多以官员的品级规定。



四、告庙策勋制。周代,天子和诸侯外出,或遇会盟、出师征伐等大事,行前都要祭告父庙(祧庙),或者一并祭告太祖庙,并派祝史祭告其他宗庙。返回后,还要向宗庙祭告。这种做法称为“告庙”。返回后要对当次行动的随行群臣进行宴请,犒劳其辛苦,对有功人员进行表彰记功,这叫做“策勋”。所以《左传·恒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这种“告庙策勋”的做法,数千年中传承一贯,成为各个朝代的一项重要制度。

以上四条制度的原则精神,一直延续到清末才结束,明白了它们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探讨北魏宗庙的情况。

《魏书·礼志一》说:

“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其岁，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曰：……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其民益神奉之，咸谓魏国感灵之应也。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

拓跋鲜卑早年“凿石为祖宗之庙”的地点，就是今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嘎仙沟中的嘎仙洞。其洞长100多米，高20多米，宽30多米。1980年为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长米文平先生所发现。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派中书侍郎李敞等前往致祭的祝文即刻在该洞的摩崖石壁上，距洞口15米，高70厘米，长120厘米，阴刻19行，每行12~16字，其半行者，则为抬头与题名，全文201字。祝文与《魏书·礼志一》所载文字基本相同，但《魏书》显然对原文作了改动。祝文中“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这里的皇祖和皇妣，只能理解为祖父和祖母，即拓跋焘的祖父拓跋珪及其宣穆皇后刘氏，两人分别被称为“可寒”和“可敦”，这表明直到太武帝时，拓跋鲜卑内部仍对其首领称可寒、可敦，汉民才对他们称皇帝皇后。又此次前往旧墟石室祭告的主要角色是谒者仆射库六官，拓跋鲜卑部落人，而中书侍郎李敞和傅窞两个汉人，只是配角而已。鲜卑石室嘎仙洞的发现，其重大意义在于证明了早期鲜卑人生活于大兴安岭一带，大鲜卑山即大兴





安岭；也证明了从居于森林时，鲜卑人就有一种“凿石为祖宗之庙”的纪念方法。这个方法的影响后来反映在孝文帝为祖母文明冯太后在陵前修筑永固石室（永固堂）上，虽然永固石室是用洛阳八风谷之黑石所砌筑，而嘎仙洞则是利用天然石洞稍事加工而已，但其为石室则前后一致。遗憾的是这次发现尚不能说明早期拓跋鲜卑是如何在嘎仙洞中进行祭祀祖先活动的。

拓跋鲜卑自大兴安岭经过数度迁徙，终于走出森林沼泽，“始居匈奴之故地”，其时间当在东汉末。此后自拓跋力微占据盛乐，拓跋鲜卑遂成漠南一股强大的割据势力。自神元帝拓跋力微三十九年（258）迁于盛乐，至道武帝拓跋珪皇始二年（397）迁都平城前，共一个半世纪，可以称之为拓跋鲜卑代国的盛乐时代。此时期拓跋鲜卑的代国，虽帝系无误，但史文缺略，其宗庙社稷祭祀，在《魏书·序纪》中就找不到记载。当然，《序记》没有记载，不等于事实上没有。《魏书·乐志》说拓跋鲜卑皇朝“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这是拓跋鲜卑族唱自己民族的英雄史诗，他们在平城的宫掖中唱，在平城祭天时唱，在平城祀祖时也唱，但不知这《代歌》在盛乐时代是否用于“郊庙宴飨”。早于魏收《魏书》的拓跋鲜卑史有邓渊的《代记》和崔浩的《国史》，不知是否有记载，此二书经道武和太武两次国史之狱，渊与浩均被诛戮，书亦不传，无从考证。以情理推之，宗庙之制源于对祖先的崇拜，产生于发展程度较高的氏族阶段，当拓